

序言：香港，1995 年

此刻，我可以吸一支雪茄，比我过去长时间在香港时更有余暇地从我的阳台上观察这个富裕的港口。我只是 4 年前才来到香港的，不过，现在我对它的看法已大为改变。三四十层楼高的大厦沿我下面那条一英里长的大道展开，一座大吊桥向西将把香港新机场与这个城市和中国内地相连。入夜，船只云集，灯光闪烁，就像各色昆虫飞快地掠过或庄严地涌过黑沉沉的海水。然而，我甚至看到这些昆虫也已没有什么水可养活了：陆地的拓展已大大减少了水面的宽度，谁知道，也许有一天水面会变得更窄，直至消失。亚洲的变化何等之快，即使现在也令我震惊和激动。这个变化将改变世界。

以后——比如说，2020 年（在我来之后 30 年）——要到亚洲神经中枢去的人，也许不会去香港，而去上海。到那时，上海将是一个拥有 2700 万人口的城市，比欧洲的一半城市、美国的许多城市都要富。它将是华人世界的一个巨大的文化和工业中心，也将是东亚的金融首府。在 21 世纪头 10 年的某个时候，它将取代香港成为中国的主要金融服务中心。此后不久，它又将超过东京成为东亚地区最高级、最开放的金融市场，进而与伦敦、纽约这两个老资格的市场鼎足而立，成为世界三大不可或缺的金融中心之一。

当然，由于亚洲地大人多，加之将富起来，这块大陆不会只有一个“中心”：亚洲 2020 年的经济景观将为十几个具有巨

大纵深的，起文化、金融、工业核心作用的大城市所主宰。中国声称将有 10 个这样的城市，包括台北和香港；香港仍将担当南部中国的银行家和东南亚华商与中国大陆之间最大的、独一无二的中间人的角色。

东南亚也声称将有几个非华人的大城市。汉城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将会在开发西伯利亚巨大的天然资源中，在中国、俄罗斯、朝鲜三国交界地区中的工业化中，以及在俄罗斯太平洋沿岸的早期猛烈的“加利福尼亚化”中，发生竞争，有时也会合作。汉城是很久以前一个统一朝鲜的首都；符拉迪沃斯托克则是俄罗斯远东地区的首府。

日本仍将有它的集合城市——东京和大阪；虽然到那时它们的角色将不再是制造中心，而是连接并管理日本一个制造业网络的服务中心；这个网络遍布东亚、东南亚，直至印度次大陆，并将通过东南亚大约 8 个大城市（马尼拉、雅加达、苏腊巴亚、西贡、曼谷、吉隆坡、新加坡和仰光）进入印度。在印度，孟买这个整个南亚和中亚的金融中心，将在几个主宰这块快速发展的次大陆的大城市中第一个入网。

发生改变的不只是亚洲的城市。事实上在 1980 年至 2020 年间将有 20 亿乡村亚洲人逐渐地、无情地脱贫；这有可能使已经开始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经济的消费和城市化更形高涨。这个过程在亚洲将不会像在美国那样，在乡村产生一种高效的、资本密集的农业经济。亚洲的乡村仍将以其能为富人提供消遣而受到褒扬——欧洲的乡村以同样方式现在仍受到重视；亚洲更会如此，只是因为它更拥挤。

最好的例子是印度尼西亚的巴厘。这个神秘小岛的丰富火山景观和混为一体的古老文化和宗教，很久以前已开始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访问者，它的简单民间耕作正变成旅游业招揽游

客的素材。那里的宗教和文化将保存下来，但是作为现代社会的一部分，它的人民到 2020 年将不再当佣人，而将享有 1995 年在美国那样高的收入。这个地方本身也将比某些不合时宜的陆地更像美国的纽波特比奇；它的房主，各国人都有，像以色列卡尔梅勒或法国普罗旺斯的那些房主一样运气好和形形色色。

我要趁机利用所有这一切。到 2020 年，预期我在上海旧时代叫做“法租界”的一个区拥有一座房子（以 1997 年市场最低价购买）。我还希望在巴厘有一个度周末的地方。

到那时，我已年过 70，因此，你们也许认为这类事对于我只有学术意义。我认为并非如此：我曾被缅甸一个会算命的（palm）读者告之，我会活得长得多。像许多在亚洲还很穷时来的西方人一样，我在这里比我回到家中更加注意这类事。不过，我也比来亚洲前更注意各种事。亚洲会使你们贪婪起来。

一、投资者须知

你们大多数人或许会怀疑本书对亚洲未来的乐观主义推论是否具有合理性。我马上将解释我的推理的依据。不过现在先假定我是正确的，来看一下未来 25 年中亚洲不断成功的金融后果。金融是正确的推理起点，因为大资产市场——货币、商品、股票、债券和不动产——中的运动，可给予我们所推论的历史最强趋势以最好的反映。

首先，我的推论是，许多亚洲货币相对于富裕世界的那些货币来说将会升值。今天若认为中国的人民币或印度的卢比将相对于美元和德国马克升值，这似乎是发疯，更不用说相对于日元了（对此，我敢打更大的赌）。不过，反观 25 年前，1970 年。那时，一般认为日本相对于美国还是一个有点儿落后的、交

通货膨胀的、不起眼的工业竞争者：360 日元兑换 1 美元。而在日元高攀的 1995 年年中，变成了 80 日元兑换 1 美元。

短期通货运动是难以揣摩的，但从长期来看，一种货币的相对价值是该国经济、社会、政治力量的一种综合量度。两个国家在经济增长率、生产增长率和吸纳足够储蓄满足投资需求这 3 个方面存在并保持大差距时，可以确信，位于这些关系偏高一侧国家的货币将相对于偏低一侧国家的货币升值。亚洲通货的趋势已经显现：1970 年至 1995 年，新加坡元相对于美元陡升；1990 年至 1995 年，除日元外，它相对于所有富裕世界的货币也都升值。其他亚洲货币将跟进。

第二，我的推论是，石油、棉花、小麦、金属之类商品的价格在实际价值上将上涨。考虑到亚洲的持续增长率和它的巨大人口，这是不难理解的。这种上涨将扭转一个 80 年代初已开始的、持续了 15 年的衰退趋势，将大大影响世界的收入分配：对于石油生产者，对于美国、阿根廷、澳大利亚、乌克兰和巴黎周围地区的高效率的粮食种植者，以及对于老商品的物美价廉的替代品的开发者和供应者来说，他们的商品将大大提价。例如，液化天然气，作为石油的代用品，将有大发展；仅仅日本在 90 年代早期就购买了一个显著的份额。

商品价格将部分上涨，这仅仅是亚洲市场大发展将使全球供需平衡发生倾斜的结果。国家一旦变富，对商品的需求就开始缓慢增长，而对于某些商品，其需求最终也会走向绝对衰落（这就是为什么环境主义者应当发起运动反对可能出现的最快的经济增长的原因，虽然还没有一个人去这样做）。然而，处于上升道路上的国家是世界上最贪婪的商品消费者。亚洲各地激增的汽车拥有者将提高对石油产品的世界性需求。亚洲人的食物结构也在改变，特别是消费更多的、需要大量粮食生产的肉，

这意味着世界粮食需求的极大增加。

加上日益收缩的亚洲供应，这些将给予商品价格以更大的压力。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纯石油进口国，并将一直继续下去。

在 90 年代头 5 年，中国为它崛起的工业经济盖房建厂已失去了其耕地的 1%。1994 年初，稻米的价格首次在中国超过美国。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物价上涨的早期信号，它们是伴随着历史上最大量人口开始进入中产阶级而出现的。

不过，商品价格也会因金融原因而上涨。物价上涨预示了通货膨胀加剧。亚洲的快速经济增长及其对资本的无厌需求，将给世界金融体系以强大的价格压力。

因此，我的推论的第三点依据是，世界将与高利率一起度过另一个世代。不管价格压力——今天，通货紧缩的压力比通货膨胀的压力更大，富裕世界正在忍受 20 世纪头 10 年以来的最高的实际利率。亚洲的长期发展将继续和深化这种趋势。

今天关于世界的慢性“资本短缺”有许多议论。总之，从全球几个大地区的投资要求来看，中国、印度、前苏联和复活的拉丁美洲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投资短缺之后，正在突然进入现代化的市场经济。然而，高利率的真正起点是在世界资本供应变小的那一刻，亦即储蓄率下降的那一刻。

在 1965 年后的 30 年中，欧洲和北美富裕国家的储蓄率几乎降低了一半。因为投资和消费并没有减少（的确，消费率还上升了）这些富国创设了借债手段，既有政府的，又有私人的，于是债台高筑。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算，全球政府债务每个百分点的上升都会把一个百分点中的 $14/100$ 加到长期利率上。较高的政府借债可以说明为什么 1960 年到 1995 年世界实际利率的增加多达 $4/15$ 。

一张新亚洲牌将开始起作用。当储蓄率 1970 年到 1995 年

在西方降低时，在东亚和东南亚则急剧上升。这使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亚洲经济（对于穷国来说）处于一种不寻常的地位；它不仅可以支付它自己的巨额投资，而且可以出口资本到西方，以弥补富裕世界的赤字。

亚洲的地位不久将会改变。在亚洲的收入升高通过某一点时，储蓄——既有政府的，又有家庭的——将开始降低。在这方面，中国的台湾提供了一个早期例子。70年代，台湾的总储蓄率大约是其生产总值的35%；90年代，是25%；1990年，台湾当局总债务等于生产总值的4%，占台湾当局开支的14%；到1994年，台湾当局债务已增加到生产总值的13%，占台湾当局开支的43%。同时，亚洲各地的储蓄也开始缓慢下降；这块大陆对政府用于公路、港口、铁路、桥梁、下水道和机场方面的、长期被压抑的投资需求，已不再能控制了。

亚洲由于其所持的反福利思想，将不会深陷于今天西方国家那样的困境。开始时，在相对意义上，亚洲储蓄与投资之间缓慢加大的差距，将不会达到西方特别是美国那种巨额政府赤字的规模。即使如此，1995年后亚洲缓慢减少的储蓄，基本建设开支的迅速增加，在世界经济中所占份额的日益升高，这三者都将给资本资源的业已极其巨大的压力火上加油。因而，亚洲将在未来的一个长时期内，帮助世界范围的实际利率保持高水平。

这种发展将交上另一次世界性转机，亚洲在其中应起一种特殊作用。这涉及到我的推论的第四点依据，它可以说明为什么在1995年到2020年间债券的回报将比股票的回报升高。乍一看，这似乎是令人迷惑的。对于几乎整个20世纪来说（记住，因历史原因，一般维持较低的实际利率），股票都轻易地胜过债券。不过，对于19世纪晚期的金融家来说，这可能是一种熟悉

的事态。那是指以前的一次大机会，其时，世界经济的大片新区（美国和澳大利亚）正在开发和建设，资本需求异常高。

亚洲对债券在世界重新景气的特殊贡献将在 1995 年后的 10 年中显现；那时，这块大陆基本建设开支的激增，在以前筹资依靠股票和银行贷款的地区，最终会导致债券的盛行。对于那些善于选择时机的人，亚洲进入债券时代（bondage）将是投资的一个难得的机会。那些看错机会，即过早进入的人，将遭受如 19 世纪美国和阿根廷铁路的那些不成熟的投资者同样的命运：不是变富，而是负债。

根据所有这一切，世界范围内的不动产价格在实际价值上也将不可避免地上涨；这涉及到我的推论依据的第五点。这种上涨主要发生在亚洲，因为亚洲毕竟人口众多，财产供应长期受到政府的人为限制，而且对有形资产的文化偏爱已在 1985 年至 1995 年间与大量积累的储蓄相结合，把亚洲许多城市的地产价格抬高到了超过西方的任何地方。我计划 1997 年在上海买房，其原因就在于此。

二、经济革命及其后果

如果金融市场是这样表现，那么关于这些市场相对于亚洲在世界地位的运动要报道些什么呢？首先和最重要的是，这块大陆令人茫然的经济成果及其日益增长的经济份量。

在本书的三分之一篇幅中（第一至第五章），你将不仅读到足够多的量度这种变化规模的数字，而且将读到关于一般经济为什么成长的解释，特别是读到关于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为什么在 1950 年后的两个世代比以前任何较大经济体有意想不到的快速成长的大量解释。这里要注意的是，倘若亚洲在未来的

分之一世纪继续增长，甚至以稍许节制的步伐增长，那么到 2020 年，亚洲的经济（包括日本和印度）将比欧洲和美国加在一起的经济都要大。

对为什么可能发生这种情形的（相对）简单解释是，亚洲特别善于全面把握促进经济增长的 4 个要素。这首先在 50 年代从日本开始 接着从 60 年代起逐渐扩展到其他东亚和东南亚国家，80 年代起扩展到中国，最后印度于 90 年代起步。在这 4 个要素中，有 3 个是直接的。其一，亚洲的劳动力成长快，干的时间长；其二，东亚大多数国家特别乐于通过教育和训练提高其劳动者的素质；其三，亚洲国家在早期阶段特别舍得把大量机器和设备方面的资本注入它们的经济，它们异常高的储蓄率也允许它们筹资这样做。

第四个要素是生产率，或者说是与其他 3 个要素相结合所体现的效率；这总是很难理解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个要素综合了对经济和社会活动方式有最深刻影响的许多因素：技术的传播和利用，社会的文化和价值对现代经济生活需求的适应，国家对新思想和外来影响的接受能力。亚洲的生产率在 1950 年至 1990 年间有显著的提高，而根据本书将说明的原因，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亚洲国家对各种新思想的影响极其开放，特别是对那些来自国外的新思想极其开放——不管是通过外贸带来的，还是通过外资带来的，抑或是通过外国技术带来的。

许多人在直觉上会不同意我关于亚洲的成功主要是它的自由贸易精神（最缺乏这种精神的地方，干得最差）的看法。然而，不管他们的观点如何，大多数西方人多半会同意亚洲存在两个大问题：亚洲还会像其 1970 年至 1995 年间那样快地发展吗？亚洲的崛起对西方是福还是祸？

三、增长减慢

我推测 在 2000 年前后，亚洲的经济增长将会突然慢下来。

不过，部分地说，任何这样的减慢都仅仅是视觉上的错觉。所有国家，随着它们的不断发展，都将逐步步入慢速增长的道路。例如，随着日本从 60 年代到 90 年代的走向成熟，其平均年增长率也从 8—9% 降至约 6—7% 再降至 3—4% 左右。东亚和东南亚的奇迹般的经济已开始走上了这条不可避免的增长减慢的轨道。不过，这些经济的起步都较晚，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成群起步的；所以当它们减速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将成群慢下来。看来“亚洲”本身将发生摇摆。事实上，我们熟悉的“奇迹”已开始失色，一些新奇迹将取而代之，例如，印度尼西亚或许会创造更大的奇迹。

然而在减速中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现代亚洲包括日本 其成功史中最大的缺憾是，它们都未能建立必要的透明而客观的公共机构，以驱动其惊人经济增长正在产生的那些较高级的社会和经济（见本序言的最后一节）。这个失误的一个方面是，大多数亚洲国家在环境迫使它们建设现代经济的基础设施之前，普遍对其采取了偷懒态度。亚洲大部分地区到本世纪结束时将不得不注入这种公共投资；开始时，这种投资将比同样数量的私人投资带来较慢的经济增长。在这方面，没有一个国家的影响有中国这样大；中国经历了这块大陆上一个持续了 21 个世纪的社会之有形基础设施和公共机构的最令人悲哀的消亡。在为建设这些东西而奋斗时 中国在 2000 年至 2020 年这 20 年中的增长率，将比它在 1980 年至 2000 年间的增长率低大约 50%。

但所有这一切的影响都不应夸大。90 年代初，在亚洲国家

（包括日本）间贸易比它们与西方贸易更有价值的意义上，亚洲成长的影响已开始超越其自身。首先是中国，适当时候则是印度，这两个国家的命运将左右整个亚洲的前途（因此，本书把四分之一的篇幅用于讨论这两个国家）；随着快速启动的中国开始减速，慢速启动的印度将开始加速。总结果将是，虽然亚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在 1995 年至 2020 年间将不再能媲美其前 25 年的成就，不再能以比西方快两倍的速度增长，但它仍将会以比西方快一倍的速度发展。这种发展仍然要提出那另一个基本问题：西方对亚洲的崛起应是喜还是忧？

四、东西相遇

在我写作本书时，住在香港的一位美国朋友建议我把此书定名为“亚洲的美国入户抢劫者”（*The American Houseboy in Asia*）。这道出了许多西方人已经开始担心的可怕事情，因为在亚洲轻税社会中积累起来的个人财富，使本书看起来仿佛亚洲很快会成为领先之人。这种担心类似于 80 年代的那种担心 其时，富裕的日本旅游者和访问者开始自信地匆匆走过美国和欧洲。像 80 年代对日本感到困惑一样，90 年代的恐亚症也是绝大的杞人忧天。

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是，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西方经济来说，对于大量西方公司及其工作人员来说，将有历史上最大中产阶级的亚洲的崛起，为它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赚钱机会。而亚洲的相对便宜的但往往教育良好的劳动力，也继续可为西方人、日本人和富裕亚洲人的公司，提供有吸引力的地点，建厂开业，生产在富裕世界销售的货物。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亚洲将为富裕世界的产品和服务提供更多的、更有诱惑力的东

西——世界发展最快的、常常也是最大的市场。

这些机会从轻消费品开始，随收入的上升，继之是耐用消费品，如电冰箱、电视、光碟机（和其中某些内装影片、音乐之类的节目），再继之是汽车、住房、旅行、教育、保健，最后是中产阶级所消费的一切。然而，机会并不仅仅在消费。西方的资本设备制造商和工厂、公路、远程通信系统及机场的建筑商，也将从 1995 年至 2005 年间亚洲资本需求的激增中获益。

除了这一切，最重要的是，由于富裕世界的银行家在争夺疏通资本流——来自世界最大未开发的储蓄源的资本流——的权利，由于西方投资者蜂拥追逐在亚洲可得到的较高回报，亚洲正在变成世界金融的增長的主要市场。这场商业金融革命的细节占据了本书三分之一的篇幅（第十至第十四章）。其概要内容是说，在 1995 年后的 25 年中，除最高级产品和服务之外，亚洲将占有几乎所有产品和服务的世界市场销售增长的一半，投入这一强劲需求流的西方公司从中将获得极大的成功。

所以，总的看来，到本世纪结束时，不可能简单地讲，亚洲的崛起对西方经济和商业是绝无好处的，虽然这将加剧现代技术使西方劳动者的一个特殊阶层——缺乏教育者——所蒙受的危险。政治家是不会攻击真正的犯人——技术——所带来的经济破坏与创造的越来越快的周期的，所以，他们当中的政客便转而猛攻亚洲人和拉丁美洲人。

就亚洲来说，这些政客至少有一个出于无心的观点。技术已经非常有效，它同等地影响了每个人，无论他们在哪里。这特别意味着，对外国的货物、思想和做事方式设置障碍，正在变得越来越困难。在数量上，亚洲无异于技术所引起的、从西方涌出的变革大潮中的一滴水。但是，在技术和社会的相互作用中，亚洲将证明自己的无比强大：在对付不断加速的变革方

面，亚洲远比美国（不管欧洲）准备得好。在经济上，这意味着，因为亚洲是很有竞争力的，其崛起将日益使技术改造西方商业和社会的力量和速度加大。不过，对于亚洲，还限于这一点。

五、强 社 会

亚洲将使业已开始破坏西方世界关于公共政策和社会组织的假设的冲击波加速。亚洲或非亚洲的金融市场已经开始告诉瑞典、意大利，甚至美国一类的国家，它们如不支付较高的利率，已永远不能自由举债了。其部分原因是亚洲健全发展的经济对世界储蓄的竞争，这一点将在西方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西方政府财政处于困境的主要原因，是想方设法也难以解决社会保障问题。在西欧，社会保障采取福利国家的形式；在美国，则是通过社会保险和医疗计划的形式。这些制度的可理解目标是创建一种有同情心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政府会阻止生活的公害蛮横地残害民众。甚至不用引用亚洲的例子，早在 60 年代就已变得越来越清楚：这些制度不仅恶化了政府财政，使利益集团把西方民主搞得软弱无力，而且导致了家庭、公民社会、法律和秩序的部分崩溃。

更不祥的是，社会保障实质上是一种保守主义的教条。它旨在防止人民反对变革的破坏性效应，实际上是防止他们反对变革，规规矩矩，因为变革的创造性是和破坏性一起出现的。由于技术力量的成长，越来越明显的是，唯一有振兴能力的社会政治组织，是那些接受并适应变革而不试图软化其冲击的组织。在应付日益加快的变革步伐的能力上，由主张采取有力行动分子组成大政府的国家，远不如那些主要冲击的承受者仍然是

构成政府和社会的较小单位——特别是家庭——的国家。部分是由于较晚发达起来的幸运，现代亚洲社会显然是属于后一类。这是亚洲向西方提出的一个大挑战。如果西方对此挑战作出正面反应，适应之——美国似乎比欧洲更可能这样做，那么西方的固有力量在世界经济竞争中将开始再次发挥作用；否则，将徘徊不前。

读者将在本书处处看到社会和政府的现代亚洲模式的一些方面，特别是在第一章和本书的最后一篇。亚洲方法的有关文献是广泛的，因为这个话题涉及到塑造现代亚洲的很多特质，如政府的作用小，税收低，公共福利少，家庭相对于国家和个人处于中心地位，普遍拒绝保护公司和人民免遭竞争和技术的冲击，对外部世界开放、乐于适应新市场和新的办事方式。

李光耀在过去 10 年中对这些方面作了充分说明，他的话散见于全书。李先生从新加坡 1959 年独立时到他 1990 年退休，一直是这个国家的总理；他多半是本世纪后半叶头脑最清楚、才智最强、说英语的政治领袖之一。在他的管理下，新加坡创造了全亚洲从贫困转变到过中产阶级生活的最好纪录之一。

不过，我推测，在 21 世纪初，新加坡将开始徘徊，将遭受远比它的任何邻国都更为严重的减速。原因是，它的习惯了极强秩序和权威的人民，将发觉自己已不能应付一些较混乱国家的生活和商业的骚动；这些国家是新加坡因其工资增长和幅员小而被迫去投资的国家：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越南。我也许能证明，现代亚洲的最大讽刺之一是，李先生这位生活和社会反保护主义观点的最雄辩鼓吹者，留下了一个拙于面对 21 世纪的新加坡。它的公民过于依赖他们政府的深谋远虑，而不是他们自己，也太经不住风险。这位严厉而溺爱的父亲，对他的孩子们过于保护了。

六、弱 制 度

亚洲在社会方面固然有大量东西可教育西方，但在现代政治经济制度的体制上，也有许多东西要向西方学习。亚洲的一个最大弱点——和可能惨痛伤害它的唯一缺陷——是它不能超越经商、管理和处理国与国关系时的非正规的和个人化的行为方式。

亚洲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没有体制的约束，这有助于快速增长；乍看起来，中国先于印度高速增长的一个原因是由于，中国没有英国殖民制度传给印度的官僚和律师方面的桎梏。同样，海外华商早期的辉煌业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自个人化的筹资和决策；这构成了他们公司的支柱。

不过，在某一时刻——通常大致在经济增长开始减慢的时候，一种更透明的、基于规则的制度，将成为必要了。公共方面正引起更多注意，不管是有形的公路或铁路，还是制度化的公司帐目——都应当既可为来自曼谷的，又可为来自纽约的潜在投资者所看懂。已开始变得越来越清楚的是，如果亚洲继续建立全球性经营的公司，那么它就不得不在管理和财务控制上寻找某些制度化的方法，而现在这些工作做起来多半有个人色彩。

在商业上，亚洲人对变革所领略的强制感，将由于市场和技术转移所引起的大组织的世界性崩溃而钝化——但只是钝化而不是消失，因为甚至在官僚的作用减小时，要求透明的压力也仍将上升。在政治上，亚洲将为使政府负有责任、不落入西方民主的陷阱、不变成特殊利益者的人质而长期搏斗。这里，通讯革命也将部分地——仅仅是部分地——通过允许大多数地方

政府用电子投票作出决定而给予补救。

就国际关系而言，将始终存在这样一种压力，它迫使亚洲为其大而分散的国家过和平生活而不是处于紧张备战状态去建立某种多边的框架；这种压力甚至没有部分的缓解。李光耀常常指出，亚洲从来没有一种本土的力量平衡，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武装力量留在东亚的至关重要的原因。这种力量单独就能保持亚洲人历史上从来不能为他们自己保持的平衡。倘若美国人离开了，亚洲将一触即发，如果它不能及时创建必要的地缘政治平衡体制，以拯救它的人民免于本世纪头几十年现代化欧洲所罹的命运的话。

因此，我相信亚洲的未来。我的信心是基于本书下面所叙述的近代史：这多半是由历史上最惊心动魄、最慈悲的革命所构成的一部历史。这场革命发生的原因是值得了解的。如果谁在 1950 年——现代亚洲的大致起点——能预见到下述历史的那怕一小部分的话，那么他就不仅是最聪明的人，而且到 1995 年也是最富有的人。

第一篇

世界的一半变了